

《揚子法言》今讀

• 紀國泰 著 •



NLIC2970661904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揚子法言》今讀

· 紀國泰 著 ·



NLIC2970651904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揚子法言》今讀/紀國泰著. —成都: 巴蜀書社,
2010. 3

ISBN 978-7-80752-554-7

I. ①揚… II. ①紀… III. ①古代哲學—研究—
中國—西漢時代 IV. ①B234. 9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34481 號

《揚子法言》今讀

紀國泰 著

責任編輯	黃雲生
出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址	www. bsbook. com
發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四川機投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張	14. 875
字數	350 千
版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80752-554-7
定價	35. 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序

在巴蜀文化史上，最早的也是最有影響的學者是郫縣人揚雄。揚雄是西漢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語言文字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不僅是巴蜀文化的巨星，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大師。揚雄生活在西漢晚期的衰敗時期，早年在成都曾向道家學者嚴君平等入學習，後來進入中央王朝，與王莽、劉歆同為黃門郎。他在仕途上一直沒有什麼升遷，但潛心治學，好博覽默思，在學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著作的《太玄》、《法言》、《方言》等傳世之作，至今仍然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珍貴文獻。東漢初年，張子侯就稱贊揚雄是西部孔子，著名學者桓譚說揚雄不祇是西部的孔子，也是全國的孔子。這是從文化上也包含從道德上對揚雄的最高評價。後來，有人對揚雄的人品發生了質疑，那不過是理學家的偏執。若揚雄真有獻媚王莽之舉，東漢初年的學者絕不敢也絕不可能將揚雄比作當代孔子。《法言》是揚雄仿《論語》而著，是以捍衛、宣揚孔子及其儒家倫理思想為主題的一部著作。這是揚雄最為重要的一部著作，不僅是研究揚雄，也是研討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倫理學史、儒學史的不可或缺的著

作。《漢書》曾詳列《法言》的篇目，以致《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凡所列漢人著述未有若是之詳者，蓋當時甚重雄書也。”自漢以後，歷代都有學者重視對《法言》的研究與整理，迄至宋代，注解過《法言》的學者先後有侯芭、宋衷、李軌、辛德源、柳宗元、宋咸、吳祕、司馬光等人，以司馬光的《法言集注》最爲可觀；清代王念孫、王引之、孫星衍、俞樾等人都對《法言》有所訂正與討論，而近代學者汪榮寶的《法言義疏》更是集歷代《法言》整理之大成。當代有韓敬教授所著的《法言注》一書，曾由中華書局出版。現在，又有西華大學紀國泰教授的《〈揚子法言〉今讀》殺青，即將由巴蜀書社出版。

紀教授知道我是國內研究揚雄甚爲勤奮的作者，故再三囑我爲他的大著作序。作序在古代是一件非常嚴肅的事，也非大手筆不可；現在作序，既得有學問，又非得有一點地位不可。我自知才疏學淺，又是最普通的老百姓，給人的著作作序是我斷斷不敢想的。但是，紀教授是年長於我的學者，讓我很難推却。序是不敢作，祇是我有幸在大家之先，讀到紀教授的這部著作，就不揣冒昧，講幾句體會，算是寫在前面的話。

與以往注解《法言》的人不同，紀教授是郫縣人，是揚雄家鄉的人。他自幼就在家鄉耳聞目睹了與揚雄相關的遺迹，與兩千年前的聖賢結下了不解之緣。雖然他的專業不是研究哲學史、思想史，但在他胸中一直有一種情愫與衝動。他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注意研究揚雄的動態，搜集相關的論著，從動手寫作此書到完成，竟達七年之久。僅此一點就可以看出紀教授此書非一時的應景之作，而是長期潛心研究的成果。這部書的前面有一篇《讀懂揚雄》，討論了有關揚雄及其《法言》的一些重大問題，紀教授公允地評價了歷史上的相關論說，並提出了有深刻見解的諸

多新論，對正確認識揚雄及其《法言》很有參考價值。而本書主體部分，將《法言》各篇分章，其分章在參考前人成就的基礎上，多斷以自己的理解，雖然多異前人，但持之有據。“今讀”部分，既有注釋、譯文，還有一般古籍整理所沒有的“按語”。我通讀了一遍，覺得紀教授的注釋精準，譯文通暢流利，對《法言》的思想有深刻的體悟。其“按語”更是能結合整個儒家的思想來發明其意義與價值。試舉 8·16 的“按語”為例，此條按語說：“儒家將‘忠’、‘恕’作為終身奉行的處世原則。孔子對‘恕’的解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揚雄以‘見畏’與‘見侮’詮釋儒家的‘恕道’，與《孟子·離婁》所說‘敬人者，人恒敬之’是一個意思。‘恕’的理論基礎是‘仁’，‘仁’的表現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揚雄說‘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更具警誡的作用。”由《法言》的“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上溯到孔子、孟子的思想，不僅可以看出揚雄對孔子、孟子思想的繼承與發展，也能够看到揚雄思想的獨到價值。類似按語比比皆是。所以，毫不夸大的說，這是一部集學術性與通俗性雙重優點的讀本，值得向人們推薦。這是我個人的一點體會，供紀教授與讀者批評指正。

己丑年十月二十四日 黃開國於四川師範大學奇響屋

讀懂揚雄

——關於揚雄及其《法言》

在兩千年來的中國文化史上，揚雄這個名字，簡直就是一個“謎”！在他生前，不少人沒有讀懂他；在他身後，仍然很少人把他讀懂。

於其人，崇拜者尊他為“聖人”，貶抑者斥之為“小人”；於其書，崇拜者“以為過於五經”，貶抑者以為祇配“用覆瓿”^①。

同是一人，同為一書，何以毀、譽如此懸殊？曰：其人難“懂”，其文亦難“懂”。

揚雄被“讀”了兩千年，時至今日，竟然連他的姓氏、籍貫尚且難以確定；至於他究竟是“古文家”還是“今文家”，是“醇儒”還是“雜儒”，研究者們衆說紛紜^②，很難達成共識。豈不是“人難懂”麼？

《太玄》草成之日，連揚雄自己也說它“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以至“難《玄》太深，衆人之不好”^③。《法言》雖不及《太玄》難知，但有人從中“讀”出的揚雄是“聖人之徒”，有人“讀”出的揚雄却是欺世盜名的“小人”一個。這豈不是

“文亦難懂”嗎？

以其人難懂、文亦難懂，使揚雄生前、身後絕少知音，甚至枉背罵名。但是有一個現象很值得注意，這就是：推崇揚雄、給他以極高的評價甚至將他視為“聖人”的，大多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如兩漢的桓譚、王充、張衡、班固，魏晉的陸績、常璩，唐宋的韓愈、柳宗元、王安石、司馬光、曾鞏、邵雍、李白、劉知幾，明代的楊升庵，清代的張問陶等。桓譚認為揚雄“度越諸子”^①，王充將揚雄與孔子相提并論^②，張衡稱揚雄是“西道孔子”^③，陸績稱揚雄是“聖人”^④，韓愈將揚雄歸入儒學道統譜系列在孟子、荀子之後^⑤，司馬光則認為揚雄在儒學道統譜系中的地位應在孟、荀之前^⑥，王安石盛贊“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祇有一揚雄”^⑦。

應當怎樣解釋這種現象呢？有學者撰文指出：

由於揚雄的學說，是他提煉了中國上古各家學說精華而自成體系的知識學問，他並不拘束於某家理論，而是承前啓後和繼往開來；所以，這在那些習慣於用某種固定的學派格式去套看所謂中國學術的人看來，就很不自在。這樣，中國歷史上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局面，即：真正讀懂了揚雄的人，無不推崇他並運用他的學說；但是，讀不懂揚雄的人，或者拘束於某一派理論之見的人，就要排斥他。^⑧

此說雖然未必完全正確，但是肯定不無道理。

筆者認為，所謂“讀懂揚雄”，就是要從他的著作中，弄清楚他究竟“提煉”了先秦各家學說的什麼“精華”，形成了他自己怎樣的知識體系；弄清楚他在中華文化傳承上做了哪些“承前

啓後和繼往開來”的工作，有什麼突出的貢獻。

“沒有讀懂”揚雄的人，往往是被《太玄》“艱深”的內容所蒙蔽，看不到它跟《法言》之間的關係，不能理解揚雄是“在爲人類社會的等級森嚴尋求形而上依據”^②，其創作目的是在向世人證明儒家倫理及禮樂主張的合理性。“沒有讀懂”揚雄的人，又往往是被《法言》“簡奧”的文字所干擾，看不到它推尊孔孟而小諸子的真正目的是爲了張揚儒家大一統的思想^③；不能理解揚雄用近四分之一的篇幅來品藻歷史人物，是要將儒家倫理道德具體化，是在摹仿孔子著《春秋》以論定是非^④。有學者撰文指出：

揚雄根據《太玄》所寫作的《法言》，則爲當時已經搖搖欲墜的儒家思想文化注入了活力，使儒家理論有了更新發展的可能性。……《易》和《太玄》這兩個玄學的主體文本，就像中國思想文化大廈中的兩根有生命活性的主棟梁，既支撐起了中國歷史思想文化大廈，而又不斷先導性地發現中國思想文化與動態歷史本身所帶來的不適應，從而爲中國思想文化不斷注入新的資源與活力，使中國文明文化長期保持了青春^⑤。

如果此說不謬，那就不難理解自桓譚以下的那些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爲什麼那樣地推崇揚雄，司馬光爲什麼認爲揚雄在儒學道統中的地位應該在孟子、荀子之上了。或許，他們正是“真正讀懂了揚雄”的人。

還有“讀不懂”揚雄和“不讀懂”揚雄的人。這就是那些“習慣於用某種固定的學派格式去套看所謂中國學術的人”。這類

人視揚雄“仕莽美新”爲大逆不道，於是因人廢言，將揚雄及其著作說得一無是處，以此顯示祇有他們纔是忠臣義士，并且炫耀自己纔是儒學正宗。

揚雄仕王莽爲“莽大夫”，歌頌王莽而作“劇秦美新”文，在《法言》中大肆贊頌王莽，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後世的揚雄研究者，在對待揚雄“仕莽美新”這個問題上，有過各種各樣的態度和說法，歸納起來，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四種情況：

一是貶斥派。以朱熹、“二程”爲代表的南宋理學家，大多痛斥揚雄“仕莽美新”的行爲。朱熹說：“揚子雲仕莽賊，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二程外書》卷十）朱熹在其《通鑑綱目》中，採用春秋筆法，寫下“莽大夫揚雄死”的判詞。學宗程朱的南宋官吏黃震說：“揚子終篇稱王莽之勤勞過於阿衡，是豈可齒善類？……迹其言議，況多粗淺，不過掇拾（孔孟）餘緒以盜名爾。”^①

二是否認派。晉人李軌注《法言》，處處爲揚雄頌莽之語開脫，於“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句注云：“或以此爲媚莽之言，或以爲言遜之謂也。吾以爲箴規之深切者也。”^②意思說，這不過是揚雄對王莽的告誡和鼓勵。清代的川籍儒生，以及曾在四川講學的晚清大學者劉師培等，爲了維護揚雄的名譽，竭力尋找各種證據和理由，企圖否認揚雄“仕莽美新”的行爲。請參看下文。

三是理解派。

現當代不少學者，認爲揚雄“仕莽美新”的行爲是可以理解的，與政治品質無關。例如，有學者指出：“‘辭不諛’言辭

謙辭。”人前南學園中隨冠簪去矢并派學師安固蘇某用效辭答“

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來看，歷史上王莽的篡漢自立和托古改制，乃是一次失敗了的政治改良。在王莽篡漢之前，西漢王朝已經極端腐敗，社會矛盾已經極端尖銳，老百姓的生活極端痛苦，大廈將傾，人心思變，已是不可阻擋的趨勢。王莽看到了這種趨勢，掌權之後，即通過示人節儉、獻錢獻地分給貧民、救濟災民、增加太學生名額、嚴懲殺死奴婢的親生兒子等手段，竭力籠絡人心；代漢自立後，又禁止買賣土地奴婢，企圖緩和社會矛盾。因此，王莽稱帝前後，受到士大夫的普遍擁護，也得到部分百姓的好感，許多人把社會改良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在這種情況下，揚雄寫作《劇秦美新論》，以暴虐的秦朝為鑒戒，期望王莽建立一種清平的政治，實在並不奇怪。這不過表達了一個善良書生的幻想，絕非什麼獻媚投靠；若要獻媚投靠，炮製幾個宣揚王莽受命於天、理應代漢稱帝的符命，豈不是更能討得王莽的歡心嗎？但他却没有這樣做。^⑨

此說立論平實、說理充分，能夠為多數人所接受，是正確理解揚雄“仕莽美新”行為的重要參考資料。

四是肯定派。

所謂“肯定”，就是認為揚雄“仕莽美新”的行為，不僅不是什麼耻辱的政治失節行為，恰恰相反，這正好表現了揚雄偉大的人本主義思想和超越前人的進步的歷史發展觀，是他“因循革化”的哲學思想的具體體現。筆者就是持這種觀點，具體內容請參看下文。

由於“仕莽美新”給揚雄身後造成的負面影響非常巨大，不僅影響到對這位文化巨人的正確評價，也直接影響到後世讀者對

揚雄著作的正確理解，所以筆者擬就這個問題作專門的討論。

揚雄仿佛是一個“謎”。不僅他一生的行事令人費解，就連他的姓氏和籍貫也讓人捉摸不定。而要“讀懂”揚雄，這也是不應該回避的問題。要全面了解揚雄，還應該知道他一生最大的“幸運”與“不幸”。至於揚雄的著作，遭受非議最大最多的是《法言》；諸如《法言》的主題、結構、語言等，前人和今人都有過不少的訾議和批評。所以亦擬對此談談筆者的看法，以期有助於《法言》的讀者。下面按照“人”和“文”來作分類介紹。

一、關於揚雄的幾個問題

（一）揚雄的姓氏和籍貫

先說揚雄的姓氏之爭。

由於漢以後的歷代文獻上，“揚雄”或作“楊雄”，於是引發揚雄究竟姓“揚”還是姓“楊”的爭論。對揚雄姓氏的用字問題，主要有以下四種分歧意見：

“字誤說”。以清人段玉裁、王念孫為代表的一派認為，揚雄姓“楊”，“揚”是誤用了同音字。其主要理由是：《廣韻》對“揚”字的解說，不言為姓氏用字，而對“楊”字的解說中有姓氏用字之說。按：此說斷難成立。遍稽姓氏用字，不見於字書解說為姓氏用字者夥，豈獨一個“揚”字？

“通用說”。清人汪榮寶在其《法言義疏》中說：“同聲通用，古書常例，托名幪幪，尤無正假可言。謂雄姓從手，與‘楊’不同，斯為妄論；必以作‘揚’為謬，亦乖通義。”按：此說難以服人。“同聲通用”固為“古書常例”，但姓氏用字不在此例；否則，“紀、季、計”三氏無別矣。若自姓氏血緣考之，“揚”氏與

“楊”氏均為伯僑之後，則二氏同；但伯僑數子，食采於“揚”地者曰“揚氏”，食采於他邑者曰“楊氏”，二氏貴賤有別，則不為一氏一姓矣。^⑧“改姓說”。現代著名學者徐復觀先生在其《兩漢思想史》一書中說，揚雄祖先本姓“楊”，後為避仇家追殺而改姓“揚”；既然已經改姓，故當以“揚”為正字。按：據揚雄《反離騷》自述，避仇改姓說不太可信。^⑨王華嚴博士又面對“古人稱姓稱氏，雲秦與”“揚姓說”。問永寧博士在其《試論揚雄的姓》一文中說，揚雄字子雲，其姓、名、字“揚、雄、雲”三字包含了漢高祖劉邦《大風歌》的全部內容，並且說西漢末“流行這種姓、名、字相互關聯的起名方式”。還進一步針對學術界有人認為“揚姓少見”的說法，舉例說明“姓揚者代不乏人”。於是論定揚雄姓“揚”不姓“楊”。按：此說結論足資參考，其根據不免牽強之嫌。^⑩

關於揚雄姓氏的用字問題，郭君銘博士的說法最有參考價值，他說：

《韓說》：「揚雄字子雲，其姓、名、字『揚、雄、雲』三字包含了漢高祖劉邦《大風歌》的全部內容，並且說西漢末『流行這種姓、名、字相互關聯的起名方式』。還進一步針對學術界有人認為『揚姓少見』的說法，舉例說明『姓揚者代不乏人』。於是論定揚雄姓『揚』不姓『楊』。按：此說結論足資參考，其根據不免牽強之嫌。」^⑪

既然從手“揚”早出，《漢書》本傳中揚雄對祖先“以地為氏”的交代非常清楚，又揚雄字“子雲”與“揚”互映，揚雄之姓為從手“揚”無疑。至於史籍中的紛亂，是因為西漢以後，從手“揚”較之從木“楊”為小姓，不為世人廣知，所以著書與刊刻者多有誤將“揚”字作“楊”者，故起紛亂。^⑫

郭說堅持“揚”為正姓，理由充足且簡明扼要，可靠可信。總之，“揚雄”不得寫作“楊雄”。^⑬再說揚雄的籍貫之爭。

在關於揚雄籍貫的介紹中，主要有三種說法：成都，郫縣，成都郫縣。一般的讀者，對文獻上的這三種說法都可能表示“理解”，因為他們不知道漢代的“成都”和“郫縣”都是當時“蜀郡”下轄的縣，根本沒有隸屬關係。而在知道漢代成都、郫縣不存在隸屬關係的人看來，這樣的說法是難以理解的。

分歧的產生緣於《漢書·揚雄傳》。《漢書》既說“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後面又說揚雄五世祖揚季“漢元鼎間避仇復溯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壠，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

《漢書》記述上的這種矛盾，早在宋代就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宋人高維幾著《揚子雲宅辯記》，採用揚雄“成都人”說，於是找了兩個主要的所謂“理由”：一是“郫不在岷山之陽”，二是根據《蜀記》所載揚雄宅地址與《成都縣志》所載廢址相符合，於是論定“是知季五世傳一子，世世爲成都人也”。

高氏的說法顯然站不住腳。所謂“岷山之陽”是指“岷山之東”，則成都、郫縣均在“岷山之陽”。宋代隱士張俞（《蠶婦詩》“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作者）在家鄉郫縣創辦“少愚書院”，後人改稱“子雲書院”，清代乾隆年間郫令任履素又改稱“岷陽書院”（今郫縣一中）。這是“岷山之陽曰郫”的鐵證。至於成都“揚雄宅”，有兩種可能：一是揚雄求學成都時確有其宅，一是《蜀記》和《成都縣志》附會杜撰。

又有現代學者撰文支持“成都人說”^②，其理由是：漢代郫縣的知名度不在成都之下，如果揚雄是郫縣人，他就没有必要在《自序》（《漢書·揚雄傳》“贊曰”之前的文字爲揚雄自述）中說自己是“蜀郡成都人”。於是作者提出，“處岷山之陽曰郫”中的“郫”不是指郫縣，而是指流經成都境內的“郫江”，並且確指，

這個“郫”就是成都少城石牛門外市橋畔的郫江之濱。

這樣的說法同樣是站不住腳、也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指稱蜀地地名，凡言“郫”者，莫不是指“郫縣”。《說文》：“郫，蜀縣也。”《漢書·地理志》：“蜀郡，縣十五：成都，郫，廣都……”揚雄《蜀王本紀》：“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言“水”，則謂之“郫水”、“郫江”或“郫別江”，概無單言“郫”而謂水名的例子。如《華陽國志·蜀志》：“冰乃壅江作壩，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水經注·江水》：“江入郫江、檢江以行舟。”因此，揚雄和班固絕不會以邑代水，用“郫”代指“郫江”。況且，郫江從灌縣到成都，迤邐七十八里，如果“郫”可指“郫江”，則郫江沿岸何處不可曰“郫”？為什麼就一定是指“成都少城石牛門外市橋畔的郫江之濱”？

筆者認為，揚雄是“郫縣人”的說法最接近歷史的真實。理由如下：

第一，《漢書》說自從揚雄五世祖揚季避難來到郫縣以後，“世世以農桑爲業”，可見揚家從來沒有因爲經商或其他原因離開過郫縣，那麼，揚雄就一定出生在郫縣。

第二，即使是在揚雄的名聲被搞得很臭的明、清兩代，郫縣人仍然認同揚雄是自己的鄉賢。例如清嘉慶十七年所修《重修郫縣志·序》說：“閱舊《志》，始知江、漢炳靈，爲何君公之所棲宅，揚子雲之所釣游。”嘉慶十八年所修《郫縣志·序》說：“郫爲成都屬邑……井絡會昌，英哲如揚子雲之文學，何君公之風節。”道光二十四年《補刊郫縣志·序》說：“郫之爲縣，吉都上古……降至西京，揚子雲、何汜鄉文章忠節，彪炳岷峨。”光緒二十四年所修《郫縣鄉土志·序》說：“望帝故都，揚雄遺宅，憑吊者猶能確指其處。”

第三，郫縣有不少與揚雄有關的歷史掌故。傳說今郫縣友愛鎮子雲村就是揚雄故宅所在地，子雲墳亦在附近（“子雲墳”見於歷代《郫縣志》）。據老輩人說，民國年間尚有“子雲亭”、“吐鳳橋”（清《郫縣志》有載）。郫縣新民場境內有“子雲橋”。郫縣唐昌鎮的“平樂山”（亦名“環山子”），傳說為揚雄向嚴君平學《易》的舊址。

第四，現代不少著名學者認同揚雄是郫縣人。已故著名語言學家和古典文學專家、《文史哲》編委、山東省社科聯副主席、山東大學教授殷孟倫先生是郫縣人，他將自己的一部著作命名為《子雲鄉人稿》，並且自號“子雲鄉人”。四川省文史館館員、著名巴蜀史專家馮廣宏先生，在著文涉及揚雄籍貫時，一直堅持說揚雄是“郫縣人”，如：“在落下閬完成治曆的100多年後，成都出了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才，他就是出生在郫縣的揚雄。”又：“嚴君平的高足揚雄（前53—18年），字子雲，祖居郫縣，務農為業。”^①四川省社科院文研所所長沈伯俊研究員在其《在矛盾中追求超越的揚雄》一文中說：“《漢書·揚雄傳》說他是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具體而言，則是今成都郫縣人。”^②

第五，關於《漢書》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矛盾的記述，筆者試作這樣的假設：因為郫縣、成都是先後的“蜀都”，唐人羅泌《路史·餘論》卷一載：“開明子孫八代都郫，九世至開明尚，始去帝號稱王，治成都。”揚雄在“自序”家世時，既不說自己是“郫縣人”，也沒有說自己是“成都人”，而說是“蜀都人”，因為後文有“處岷山之陽曰郫……世世以農桑為業”的記述，讀者應該明白這“蜀都”是指郫縣（《法言》中就有不少這樣的筆法）。班氏父子在編著《漢書》時，祇是感到“蜀都”不合地名規範，而沒有理解揚雄的用心，於是隨手將“蜀都”改為“成都”。古

代文獻上類似的錯訛原因并非鮮見。當否，謹供參考。

總之，在揚雄籍貫的爭論中，“郫縣”說是最可信的。一般的揚雄研究者慮不及此，往往徑採《漢書·揚雄傳》而謂之“成都人”，非川籍學者尤其是這樣。

（二）揚雄的“幸運”與“不幸”

在四川籍的古代學者中，就其學術成就和影響而論，以揚雄類比蘇軾，應當是一點也不為過的。揚雄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以《太玄》奠定了自己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的一席地位，更以《法言》使自己贏得在中國儒家道統中的“大儒”之尊，他又是世界上從事方言研究的第一人，他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辭賦家”^②。除此之外，他在文字學、天文學等方面的成就也是頗令世人矚目的。據說，“他有非常豐富的音樂知識，曾著有《琴清音》一書”^③。因此，有人說揚雄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才”^④。如果僅就揚雄“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⑤的個人志向來說，他的志向實現了，可能還遠遠超過了他的預期。

在揚雄所有的著述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是《太玄》和《法言》。有學者認為，“《太玄》的創作目的在於解說儒家倫理……為人類社會的等級森嚴尋求形而上依據。……而《法言》一書是揚雄表述其成聖志向、闡述其內聖外王思想之作。”^⑥漢至唐宋的諸多儒學大師，不僅盛贊揚雄捍衛儒道的偉大功績，而且將其納入儒家道統譜系，將他視為繼孟子之後的一代大儒和聖賢。例如：

北宋殿中侍御史柳開說：

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⑦